

惨胜

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

马振犊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惨 胜

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

马振犊 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 / 马振犊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08-1183-8

I. ①惨… II. ①马… III. ①国民党军—
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史料 IV. ① K265.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2123号

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

作 者 马振犊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22
字 数 357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183-8
定 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本书是抗战正面战场研究方面一部重要著作，作者依据档案史料著成，见解独到，至今在国内外学界仍有重大影响。1993年初版时名为《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民国史专家茅家琦作序，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撰写出版寄语郑重推介。1994年再版时，采纳著名民国史专家李新、刘大年建议，改名为《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

现经作者再次校订，我社重排体例，仍以《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之名出版，以飨读者。

九州出版社

2012年5月12日

序

马振铎同志的新作《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我是个小学生。阅读了这部书稿，我得到很多知识；能够有机会和读者谈一点体会，我是很高兴的。

近几年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方面的佳作不断出现。马振铎同志的这部著作，几乎在每一章里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体现了作者“人无我有，人详我略”的写作原则。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发动抗日战争的关键人物是蒋介石。学者们已经从各个方面分析了迫使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的客观原因。本书作者着重从蒋介石个人的主观因素、思想观念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民族主义思想是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内因。作者说：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最终不能容忍日本的侵略，也不会做“儿皇帝”，因此走上抗日的道路是必然的。作者同时也指出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他错误地选择了“安内攘外”的战略，“误国”的后果是严重的。

对抗战正面战场历次战役，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论点。

在早期华北战场论述方面，作者从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集团的崛起及其与蒋、日双方的微妙关系，说明华北战场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宋哲元集团的对日妥协与幻想。本书对宋哲元、张自忠的对日态度进行了具体的深入的研究。

关于“八一三”上海战场，本书作者对国民政府采取“引敌南下，以我之长，克敌之短”的战略，给予充分的肯定。

对鲁南战场，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台儿庄一役是有启发和辅助作用的，但主要战功应归于李宗仁。作者明确表示不同意“日军战略撤退说”，同时还肯定了我军徐州撤退的正确性。

本书分析了以“湘北大捷”为代表的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正面战场的作战特征。当时蒋介石认为，中国牺牲已达顶点，不能再继续牺牲下去了，在敌人进攻时只

能进行有限作战，即日军进攻，我避其锋芒，保存主力，并消耗、疲惫敌人，待其后撤，再恢复原来的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国际战略上，国民政府欲以英、美为主力抵抗日本，“等待”胜利。在这个问题上，中英美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与矛盾。本书作者认为，这些战略构想形成了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发展特点。

对缅甸战场我远征军的作战功绩，本书作者给予肯定，认为远征军对盟国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作者还充分论述了中美英三国从各自利益出发，在印缅战场上的合作和矛盾，正确评述了美国远东政策在“二战”中的利弊得失，明确地指出英国政府与军队在印缅战场的自私与失误，力图从盟国战略关系的高度来评论中国远征军两次缅甸战役的胜败原因及其影响。

本书作者还认为，正面战场不存在一个“反攻”过程。本书叙述了胜利前夕的正面战场情况，说明国民政府并未制定具体可行的反攻计划。日军发动“一号作战”，造成正面战场一次空前的大溃败，这正是“等待”战略造成的恶果。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出于全局战略的考虑，日军开始从云桂前线撤退，收缩兵力，以稳定后方，国民党军队只是“跟进”而已。收复广州的计划虽然出了台，但不及实行，日军即宣告投降。

作者在资料利用方面力求做到充分、真实，大量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包括已公开出版的和尚未公开出版的，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若干年来，台湾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档案和其他各种资料，本书作者也充分利用了。对海内外出版的专著，本书作者注意吸取其成果并在书中加以介绍。广泛运用有关资料，认真吸取各家的研究成果，是本书取得成功的基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坚持“人无我有，人详我略”的写作原则，除必要者外，一般不叙述各战役的具体作战过程，而采用“跳出圈外”的方法，即从战役之外写战役，从全盘战略的高度写战役，从政治、外交及当权者的思想观念角度写战役，力求写出新内容，做到“老调新弹”。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总之，本书成功之处在于“写出新意”四个字。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写了上面的一点体会，供广大读者参考。马振铎同志是一位青年学者，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中华民国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茅家琦

1992年9月于南京

出版寄语

我和马振犊先生再次晤面是在1993年1月。当时，我们都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中日近百年关系史国际讨论会”。在会议期间，马振犊先生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的研究课题，我对他的研究课题十分关注，并一直期待着他的成果能早日问世。会议至今，刚刚半年多时间，便闻他的专著已经出版，吃惊之余，又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部专著预期在日本也会很受欢迎的。因为我国有关日中战争的研究著作虽然非常之多，然而，像以马先生这样的观念和方法写出来的专著则极为少见。在日本，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对本国的侵华战争进行反省的人们往往忽视军事史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相反，那些重视军事史并详细地撰写战记或军人传记的作者们，往往在观念上又缺乏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及其侵略的深刻反省。

马先生在本书中尖锐地批判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侵略行径，并表示了不让这种侵略战争再次重演的立场，与此同时，他仍然始终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公平地探讨各种立场并加以评价，详尽地分析战争的整体的演变。以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得出的学术上的见解和主张确实具有说服力，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湾、日本以及世界上的大多数的专家以及普通读者中也将赢得同感和赞许。在此意义上，在衷心祝贺该书出版之际，我坚信它将会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而且，像这样出色的专著，日本的读者也衷心期望能尽快地读到。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姬田光义

李继锋 译

作者手记（一）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段非凡的历程。近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对抗战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从整理编纂史料到撰写论文专著，可谓硕果累累。但是在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中，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讨论。我自1983年从事民国档案史料编研工作以来，因工作关系及个人兴趣，对抗战战争正面战场着意进行了考察，做了一些积累。感谢《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给了我这次机会对抗战正面战场之研究阐述自己的一些拙见。在当前商品经济滚滚红尘之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非凡的勇气卓识，出版这套丛书，为祖国文化事业与史学研究贡献良多，可敬可佩。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民国史学界诸位师长及同仁的诸多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万仁元副馆长、《民国档案》杂志社陈兴唐主编的支持与鼓励，得到了同窗学友李继锋、张益民以及方世凤诸君的直接帮助，夏军小姐为本书誊稿，王跃年君为本书复制附照，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尤其令我感激的是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历史系茅家琦教授对本书之写作热心鼓励并为之书序，台湾中研院院士、著名史学家张玉法先生为本书题词，日本中央大学姬田光义教授为本书的出版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出版寄语，给我莫大鼓励，谨此致以至诚谢意！因个人学识水平所限，拙著不免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敬祈读者批评指正。如果说本书中尚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那是因为立于先者之肩的缘故。

最后，衷心感谢给我以莫大支持的我慈爱的父母与爱妻。

（本文为1993年作者所写“后记”）

作者手记（二）

《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一书出版后，不足一年时间，在海内外民国史研究学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许多史学界前辈及专家学者纷纷给作者来函或撰写书评，对拙著进行了实事求是的中肯评价，其衷心爱护热情提携之挚意令人十分感动。在这里，我要借本书更名重印之机，对于我关怀鼓励并为拙著提供宝贵意见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谢意！他们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新先生及韩信夫、刘敬坤老师；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刘大年会长；

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

上海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唐培吉院长；张劲副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秘书长李永璞教授；

河南民国史研究专家王德中先生；

台湾中研院图书馆主任张瑞德研究员；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齐锡生主任；

香港慕光英文书院校长、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主席杜学魁先生；

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日本侵华研究会负责人吴天威先生等等。

尤其令本人感激的是本书的出版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本书之重印完善付出了艰辛劳动，他们的敬业精神，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不计经济得失为本丛书之出版锦上添花的远见卓识之举，足以赢得史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的敬佩，作为本书的作者，谨此向他们表示我个人的衷心感激与敬意！

遵照李新、刘大年等先生的意见，本书重印时更名为《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以使之更严谨贴切，并对国民政府八年抗战之光荣与胜利成绩作出高度而科学的评价，相信广大读者对此亦会持有同感。

本人希望继续就本书内容以及抗战正面战场之研究诸问题与史学界同仁与广

大读者进行研讨磋商，欢迎各位继续提供宝贵意见，以使本书更臻完善。

(本文为 1994 年 9 月 28 日作者所写“重印后记”)

导 言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两大主要内容之一。近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关于抗战正面战场研究从无到有、从略到详，除整理出版了大批有关历史资料外，还出版了一些专著和大量的研究论文。但是，从总体研究上看，大陆史学界关于正面战场研究目前尚处在初创与起步阶段，不少研究成果仍局限于介绍发生在正面战场上的几次主要和较大规模的战役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此项研究仍处于一种“就战役论战役”的状况，在宏观上缺少对整个正面战场我方整体战略的考察，在微观上缺乏对各主要战役战略背景性因果关系的总体分析。台湾史学界过去虽然在这一方面做过不少探索，也取得不少成果，但受政治等因素的局限与束缚，整个研究仍存在一些弊端，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客观而有失偏颇，或着意拔高或故意隐讳等。

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史上异乎寻常的重要阶段，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大陆的 22 年中（1927 年开府，到 1949 年离开大陆），抗战就占去了其 1/3 强的时间（如果从 1937 年开始计算的话）。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更紧密地与外部世界联系了起来，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中中国成了世界上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舞台上的重要一员，有力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所以就中华民族而言，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但就国民政府而言，它又是一场足以改变其命运的对外反侵略战争。遗憾的是国民政府出于其自身的原因而不能很好地把握利用这一机会，最后迅速地从“胜利”的巅峰落入崩溃的深渊。所以，抗日战争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亦是一件极具深刻历史意义的大事。八年抗战中，国民政府所领导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因而研究正面战场是研究国民政府抗战历史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

实际上，发生在抗战正面战场的各主要战役，其起因、发展经过与结局，不

仅出自敌我双方的军事性战术性因素，而且具有更广泛深刻的战略原因，甚至具有超越军事因素以外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战略关系等因素。搞清其来龙去脉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推动抗战正面战场的研究会大有裨益。

要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正面战场，首先应注意的即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分期问题。

早在抗战时期，中共领袖毛泽东就曾根据战争实际与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等情形，将这场战争划分为三大阶段。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认为，抗日战争应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毛泽东的观点符合抗战实际，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甚至亦得到了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的赞同，例如何应钦就曾在其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中认同了抗战三阶段理论，不同的是他将抗战三阶段称为“守势时期”、“持久战时期”与“反攻时期”。在政治家们的观点影响下，海峡两岸的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曾不约而同地将抗战三阶段论作为抗战研究之基本理论，不同的是在具体划分时间上有所相左。其区分比较情形如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大陆	战略防御阶段 1937.7.7-1938.10	战略相持阶段 1938.11-1945.7	战略反攻阶段 1945.8-日本投降
台湾	抗战初期 1937.7.7-1938.10	抗战中期 1938.11-1941.12	抗战后期 1942.1-1945.8

近年来，随着抗战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两岸史学界对“三阶段”学说都提出了异议。议论的焦点集中在：第一，真正名义上的相持阶段是随武汉会战的结束而到来，还是延续到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第二，抗日正面战场究竟是否存在一个实际的“战略反攻”阶段？有关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讨论，本书将在正文第六章和第八章中分别展开。在这里，第二点也就是说有无战略反攻阶段是将抗战划分为两阶段还是三阶段的重要区分标志。台湾学者张玉法先生是两段说的代表，他在《中国现代史》（台北东华书局 1977 年版）一书中以 1938 年 10 月武汉陷落为界将抗战分为前后两期，并称之为“以空间换取时间时期”与“对峙迂回时期”，表示了对“否认反攻阶段存在”观点的认同。

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得较多、分歧也比较大的问题。一些日本学者和部分中国学者对流行多年的抗日战争上限为“七七事变”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即是说对“八年抗战论”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抗日战争的起点应是“九一八”

事变。不仅如此,“九一八”事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持此论者的根据有四:(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和阶级关系也由此发生了极大变化。(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虽未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但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和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从未间断。(三)“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曾忽视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事实,对民族斗争采取了性质不同的错误政策,但在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基本矛盾这一历史主流的影响下,两党最终还是实现了由阶级斗争向民族斗争的转变并最终实现了合作。(四)从日本方面来看,从“九一八”至“七七”的几年里,虽然其侵略手法与“七七”之后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有所不同,但其战略目的是完全一样的,即都是为了灭亡中国。^[1]显然,这种观点及分析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研究的是抗战正面战场,是从纯军事角度来研究抗战,即就“战争”而论战争,而不是从政治、政略及外交关系等角度来研究抗战,因而为了方便起见,还是从全面抗战爆发的标志“七七”事变开始为好。也正因为这样,在此我们暂不介入“十五年战争”和“八年战争”的讨论。

基于此,我认为对我国八年抗战的阶段及其期限的划分,应该更加细致一些。台湾《抗日战史》总编辑魏汝霖先生在详细考察了中日双方的历史资料之后,提出了以日本对华作战经过及战略转变为标准来划分中日战争为八个阶段的主张。他的“八阶段”论内容是:(一)日本陆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1937年12月);(二)日本海军发动上海作战(1937年8月中旬—1937年12月);(三)徐州会战(1938年1月—1938年11月);(四)武汉会战后,日本侵华政略战略重新部署(1938年12月—1941年12月);(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之战斗(1942年1月—1943年12月);(六)日军“一号作战”时期(1944年1月—1944年8月);(七)日军在中国战场准备对美苏作战时期(1944年12月—1945年7月);(八)日军战败投降(1945年8月)。

魏氏的“八阶段”说较之以前的“二阶段”论、“三阶段”说虽更细致,但其依据的是日方所提供的资料、立于日方的角度来确立划分标准的,而且其中又有重复(第一、二阶段之间)和空缺(第六、七阶段之间)现象。划分中国抗日战争阶段应当是立足于我方。只有这样才能更切合我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从而更具有科学性。当然,魏氏的“八阶段”说为我们细分抗战阶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设想的基础上,我认为国民政府抗战正面战场应划分为六阶段:

第一阶段：从“七七事变”到徐州失守。此为我国抗日战争之初战阶段（1937年7月7日—1938年5月）。

第二阶段：从花园口决堤到武汉保卫战结束（1938年6月至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阶段，抗日战线深入我国华中地区。

第三阶段：从武汉失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1938年10月至1939年10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调整内外战略时期。

第四阶段：从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39年10月—1941年12月），国民政府抗战进入消极阶段。

第五阶段：从中国战场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球战局到“豫湘桂战役”结束（1942年1月—1944年底），国民政府抗日战事进入“外紧内松”状况，中国正面战场战事遭受重大挫折。

第六阶段：国民政府军队从局部“跟进反攻”到迎来最后胜利（1945年1月—1945年8月）。

本书在内容安排上即是遵循这一“六阶段”原则的。

抗战第一阶段虽分别在华北战场（冀察晋绥）、华东战场（沪苏）、山东战场等地区展开，但我们不难发现，抗战爆发之前，华北地区冀察晋绥各省与山东之政局具有相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处于地方实力派控制之下。当时主持河北的是宋哲元，统治山西的是阎锡山，主政山东的则是韩复榘。在战前他们都因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有隙而与日本方面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合作关系。他们与日本合作的目的决非是要卖国做汉奸，无非是想利用日本的政治经济力量来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但日本军阀为了吞并中国，竭力拉拢各地方实力派，给予他们援助与支持，企图一步步迫使其上钩，走上卖国投日的汉奸之途。对日方的这种阴谋，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都有不同程度的洞察，都曾明确表示决不上当，决不卖国。但宋、阎、韩三方对日本灭华野心之认识是存在着差异的，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早晚亦有不同的估计。而这些决定了他们在抗战爆发前夕的抗日准备工作和开战后的抗日决心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战争爆发后正面战场上河北、山西、山东战局之不同结果。而这些正是在抗战第一阶段北方正面战场战事发展演化的重要战略原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和发动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对这一战役南京国民政府是早有准备的，其直接目的是利用我方在华东的既设国

防工事，在淞沪引发战事，迫使在此地区拥有巨大利益的英美列强出面干涉，从而有效地阻止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同时还有吸引日军主力从北方南下，改变其侵华路线由自北而南变为由东向西的战略意图。淞沪抗战的结果虽然没有达成迫使英美出面干涉的目的，但却实现了后一种战略意图，即改变了日军的侵华路线。这一成功之举无疑对日后我方的抗日正面战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引敌南下”战略的实现，并不仅仅是通过“八一三”一役来完成的，“八一三”只是一个成功的开端。随后的徐州会战乃至花园口决堤直至武汉会战等一系列战斗都是以实施并完成这一战略意图的不可缺少的手段。甚至可以说在抗战第一、二阶段我军的行动都是围绕这一战略意图进行的。虽然其中也出现过反复曲折，但通过这一行动我军成功地达成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目的，日军由此一步步陷入了我国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走上了必然灭亡之途。

以武汉会战为标志，日军的战略进攻力量已达极限，这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即可得到说明，此战日军在未达到作战目的的情况下因力竭而被迫退回原防线。此时，国民政府的内外战略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我抗战正面战场第三阶段作战已告结束。

随着正面战场日军战略进攻的结束和国民政府内外战略的调整，敌我两军在总体上呈现了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此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我国抗战第四阶段。这一时期正面战场的形势是敌我各有进退，虽然战斗次数并未骤减，但以前那种空前激烈的大进大退式的战争已不存在。鉴于此，中日双方统帅机关都将单纯的军事较量升级为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多层次的斗争，这一阶段正战场上发生的各大军事行动无论日方还是中方都往往是为达成其他目的服务的。例如，为打击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日军展开了对我大后方各大城市的狂轰滥炸；为了策应香港之役，日军发动了第二次长沙会战。而中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远征军入缅作战，虽然这是为了保卫我方重要补给输血线“滇缅公路”，但这一战略目的从一开始即已不存在，就在当时，即我军在国内战场处处吃紧的形势下，却仍然派出装备精良的生力军出国作战，与英美盟军并肩打击日军，甚至在滇缅路被截断之后依然为掩护英军撤退而与日军浴血奋战，其国际政治战略因素是不言自明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直接汇入世界反法西斯的全球战局，正面战场的抗日进入第五阶段。此一时期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变得“外紧内松”，其主要注

意力转向努力以各种手段争取外援，让英美替自己打日本，在国内战场则消极等待胜利。这一方面是出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保存实力以备内战”的政治决策，另一方面也是英美方面企图“牺牲中国保护自己”自私利己行为使然。在这一因素影响下，国民政府从上到下，抗日意志逐渐衰退，内部腐化日趋严重，最后导致在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的大惨败。在这一阶段，中国抗战正面战场遭到了重大挫折。

1945年后，随着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国际形势大为好转，日军最终失败已成定局。我国抗战正面战场亦进入了最后阶段。在美国的装备下，国民政府开始整训武装新式军队，并在湘西芷江击败了日军的最后进攻，赢得了八年抗战最后一次战役的胜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仓促制定了局部地区的反攻计划，但因日军战略总撤退已经开始，这一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中国军队在桂柳等地未经激战，“跟进”反攻，收复了一些失地。随后，日本便在盟国联合打击下宣告投降，八年抗战就此结束。

总结我国抗战正面战场，我们发现，虽然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曾在抗战各阶段一再制定过抗敌战略方针，并努力贯彻之，但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战局的主动权大多为日军所掌握，因而这些战略设计多数不能得到完全实施。正因为这样，整个正面战场的各阶段战局的发展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然进程的因素。就我方而言，所谓有准备有计划而又达成目的的军事行动，为数不多，越是到抗战后期，这种情况愈发明显。但就抗战正面战场总体战局来看，我方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引敌南下退守西南”的战略方针最后基本得到了实施。历史证明，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依靠其正确的战略思想与指导方针，终于战胜了一个国力强盛装备精良的对手。

由此我们认识到，一方面抗战各阶段各具特色，但又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联系各阶段的那根主线即是“持久抗战”战略。在此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不应因抗战中后期当局抗战意志的衰退等因素而导致许多战局的失误，来否定这一总体战略构想。

抗战正面战场是相对于抗战的敌后战场而言的，因此为了深入了解正面战场，我们不能不对其与敌后战场的关系作一说明。这里所说的敌后战场是泛指我国军队在沦陷区开辟的抗日战场，不仅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而且还包括国民党领导的敌后武装。

过去大陆史学界存在一种片面认识，认为“敌后战场”只是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活动区域。实际上国民党方面也曾在敌后留驻了大量武装力量，并开展了许多抗日活动。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目前在大陆史学界已逐步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关于抗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这两个战场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3]毛泽东在论述八路军敌后游击战成功经验时指出：“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的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4]

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对于配合正面战场和作战，顺利地实施持久消耗战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开辟敌后游击战场是国共两党的共识，这一战略行动有其整套的理论基础及实施步骤。在抗战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国民政府方面已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高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蒋介石曾明确指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5]其目的在于“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6]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则自抗战一开始就深入敌后，发动民众开展全民抗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二，我军在敌后战场的活动，有力地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严重威胁了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使其始终不能集中力量用于正面战场，这对我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是有力的支援，在战略上扩大了对敌作战空间，延长了作战时间。在抗战初期的忻口、台儿庄和中后期的武汉、长沙、中条山、浙赣、豫湘桂等历次重大战役中，敌后战场都直接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他们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方式参与对日作战，有力地打击和消耗了日军，并先后击毙了三名日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为正面战场抗战作出了直接的贡献。其三，我军的敌后战场作战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政权组织，建立扩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使沦陷区的民心得以维系，中国政府的政令得以贯彻，它与正面战场大后方中央政府上下沟通，共同支撑中国持久抗战之大局。

总之，敌后战场的开辟是我国“持久抗战”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之一。它与正面战场的关系是共存互依、相辅相成的。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敌